

“大国之学”的前沿担当：

广东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优势与路径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胡文涛

□胡文涛 原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广东是国家联通全球的战略枢纽,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践行使命、展现作为的重要阵地。随着区域国别学于2022年被正式列为一级学科,其作为大国之学、战略之学、实用之学的定位更加明确。广东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侨务资源丰富、经贸网络发达、创新动能强劲、治理体系完善,在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具备扎实基础和显著优势。广东有必要立足实际,聚焦大湾区实践,系统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积极呼应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立足现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广东学派”,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广东智慧与力量。

一、立足“两个前沿”，肩负国家使命

广东地处我国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两个前沿”，深入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应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聚焦以下四方面。

一是构建“理论粤军”，助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广东拥有深厚的对外交往历史、丰富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独特的侨乡文化资源，可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经济特区经验总结、跨境治理模式提炼等方面形成理论突破。通过对本土知识进行学理提升，聚力构建起扎根岭南、服务国家的“理论粤军”，不仅能够丰富区域国别研究的“广东视角”，也可为国家周边外交和全球治理提供来自一线的实践智慧，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二是服务高质量发展，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6年位居全国第一、外贸总额连续39年位居全国首位的经济大省和开放前沿，广东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

链。“走出去”不仅是资本流动，更是发展模式、规则标准与人文价值的深度互动。区域国别研究可聚焦东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加强对产业政策、经贸规则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动态研判，发挥好“战略雷达”和“决策智库”功能。例如，研判“全球南方”消费升级与技术变迁趋势，为企业跨境经营提供前瞻性、精准化的信息支撑与风险预警，助力广东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三是支撑大湾区建设，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路径。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试验田，其核心任务不仅在于促进要素流动，更在于构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体系与规则“软联通”。区域国别研究可在其中发挥“战略解码器”与“治理黏合剂”作用：通过对欧美在数字经济治理、金融监管、人工智能伦理等前沿领域的制度演进进行解析，为大湾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供参考；通过深入研究东盟、葡语国家及其他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的社会结构、法律政策和可持续发展需求，支持企业精准布局全球产业链与创新链。在数字经济、绿色金

融、低碳技术和人才流动等重点领域，加强国别比较与政策分析，为推动大湾区从“开放窗口”迈向“制度创新高地”提供学理支撑和路径参考。

四是开展精准国际传播，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建议》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传统的宏大叙事往往难以穿透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场，而基于扎实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传播，是实现从“音量”到“效度”飞跃的关键。这意味着研究需超越简单的语言转换，深入研究对象国的历史经纬、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媒介生态，从而将“广东实践”“大湾区故事”转化为更具共情力、说服力与适配性的国际传播叙事，为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建设提供源自广东实践的有力支撑。

二、发挥本土优势，筑牢研究基础

广东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显著优势，为其深化研

究、服务大局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是历史与实践底蕴深厚。自清代“十三行”以来，广东一直是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枢纽，更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思想交汇的前沿。深厚的开放传统，使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承担起“试验田”使命，积累了丰富的涉外实践经验，构建了广泛的国际交流网络，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为观察和研究世界提供了鲜活样本和一线视角。广交会等国际平台，既延续了广东作为经贸主通道的传统，也成为洞察全球经贸动态的重要窗口。

二是侨务资源规模庞大。广东拥有全国最多的侨务资源，数千万粤籍侨胞遍布全球，尤其深度融入东南亚经济社会网络。他们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经济合作的桥梁，更是我们了解全球各地社情民意的重要纽带。这支独特力量，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丰厚的社会资本、直接的田野调查渠道与深入的观察视角，显著提升相关研究的话语建构能力与实践解释力。

三是语言文化基础扎实。广东是粤语、客家话、潮汕话等汉语方言的重要分布区，其语言文化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省内高校开设的东南亚小语种和多种外语专业较为齐全，汇聚了一批外语人才，为深入对象国开展原始资料研读、田野调查与文化解读提供了语言支持。

四是对外交往平台丰富。广东对外交往活跃，友城关系众多，领事机构聚集，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官方与半官方交流机制。这为获取第一手信息、开展政策对话、建立学术合作、组织联合研究提供了便捷渠道和高端平台。

五是新型智库体系健全。广东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新型智库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已形成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为核心的多类型智库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各机构定

位清晰、优势互补，拓宽了研究覆盖范围。深圳充分发挥先行示范区作用，推动社会智库迅速发展，形成有力补充。粤港澳智库合作持续深化，通过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正逐步构建起布局完善、支撑有力的新型智库体系，为国家和区域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持。

三、探索研究路径，完善体制机制

广东应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本省实际，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引领、以优势资源为驱动，系统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广东特点的研究路径与实践模式，为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引导。建议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规划。通过省级统筹，制定转型行动计划，明确重点研究方向和实施路径，聚焦东南亚、RCEP成员国、非洲及葡语国家等关键区域，构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研究体系。推动高校和研究机构依托学科特色实施“一校一品”“一院一专”错位发展策略，形成布局合理、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研究矩阵，全面提升整体研究能力与学术声誉。

二是搭建高能级学术平台体系。可重点支持建设若干省级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强化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增强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积极构建国际化合作网络，发起或参与国际学术组织，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设立中外合作研究中心，定期举办高水平国际论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三是创新科研组织与支持机制。建议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专项基金，稳定支持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保障田野调查和跨国合作资源投入。

大力推动跨学科协同攻关，鼓励打破学科壁垒，组建融汇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及数据科学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开展综合性、多维度的区域国别问题研究。进一步完善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推动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政策咨询、教学资源和公共知识产品。

四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可创新“外语+专业+区域国别”培养模式，推动学生实现“专门通”“领域通”“国别通”的能力融合。设立双学位与微专业项目，加强对对象国语言文化沉浸式学习。强化实践导向，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学生赴目标区域开展实地调研与田野调查，依托海外合作院校、企业和机构建设实习研究基地，提升跨文化沟通与真实问题应对能力。

五是深化政产学研协同与知识转化。建议搭建政产学研对话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政府-企业-智库-高校交流机制，围绕“走出去”面临的现实问题组织联合研讨、需求对接和专题调研。支持建设覆盖重点国别和地区的政策法规、投资环境、风险预警、舆情动态的公共数据库与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信息服务的系统性和实效性。

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与学术话语权。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部署，支持学者在国际主流学术平台发表研究成果，主动参与和设置国际学术会议议程，推动创办高水平准英文区域国别研究期刊。构建多维传播矩阵，采用对象国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阐释基于扎实研究的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胡文涛，肇庆学院副校长，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肇庆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贞，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讲师

（曾丹凤博士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头像绘制 蔡红）

高质量推动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

□谢铭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随着新就业群体持续壮大,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仅是做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的必然要求,更是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关键之举。

高质量推动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时代意蕴

在新就业群体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了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这一群体呈现出数量庞大、流动性强、思想活跃、联系面广的社会特征,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也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和重要阵地。高质量推动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与深远意义。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一方面,新就业群体规模庞大、增长迅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这一日益增长的庞大群体“组织起来”,将其纳入“两个覆盖”,增强其对党的政治认同,有效对其进行政治引领和组织动员。另一方面,要切实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服务工作,加强群体联系、了解群体诉求、协调解决群体“急难愁盼”问题,维护好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切实增强党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

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新就业群体与社会联系密切,群众接触面广,深度参与城市生活服务与治理进程,是基层治理中重要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他们既是社会治理的对

象,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宝贵资源。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是城市的“移动探头”,对社区服务、安全隐患、民生需求、应急管理等方面有着最直接、最敏锐的感知。可以通过党建工作将他们组织起来、联结起来,动员起来,激发其社会主人翁意识,引导其积极参与平安建设、文明创建、养老服务、志愿服务、应急救援等,有效弥补基层治理的“短板”,将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利于体现党对经济社会的领导能力,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首先,有利于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行业发展优势。通过在平台企业设立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等,保证平台企业经济行为符合国家利益、社会效益、企业利益的有机统一,实现良性发展。其次,有利于推动企业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党建引领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企业遵守行业规范和提供优质服务,将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团结友爱、诚信经营等价值观融入平台企业文化建设中。最后,有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党组织可以通过协调各方力量,积极解决新就业群体关注较多的问题,例如收入稳定性、劳动权益保障、社会保障、职业发展空间、精神文化生活等,着力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高质量推动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的路径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提升党对新就业群体的政治引领功能。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新就业群体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充实扩大党员队伍,注重从优秀的新就业群体中发展党员,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探索在平台企业、产业链、园区、楼宇等建立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集中的社区、街道建立功能型党组织,确保“两个覆盖”。探索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选中,适当增加新就业群体的代表比例,拓宽其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根据新就业群体特点创新思想宣传方式方法。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体建设理论宣传阵地,运用新就业群体喜爱的网络话语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探索理论宣传与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发展、日常生活、技能培训等紧密结合的教育方式,融入新业态业务发展需求与实际困难,提升思想引领的实效性。引导新就业群体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献社会,挖掘和宣传行业内的党员先进事迹,加强榜样引领,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行业发展精神。

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切实强化党凝聚服务群众功能。推动党组织靠前动员服务,在城乡社区、商务楼宇、交通枢纽等建设“司机之家”“骑手驿站”“暖心角”,设置党员服务驿站,提供日常基本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灵活增设激励措施、加强政策保障,鼓励新就业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紧急救助等,让他们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增强归属感。同时,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拓展服务内容,精准提供健康体检、子女托管、联谊交友等多样化服务,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的联动协同能力。支持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新就业群体中提供法律援助、争议调解等服务。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关爱新就业群体,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新就业群体发展的合力。联合有关行业协会,积极开拓平台经济多元化业务,促使新就业群体展现职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总之,高质量推进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顺应时代发展、应对风险挑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工程,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要持续将这一新兴领域打造成党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的坚实阵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重点项目《数智技术创新“大思政课”文化场域建设研究》(25VSZ022)阶段性成果

侨乡文化数字化传承弘扬的路径探析

□江传月 莫海霞

侨乡作为华侨华人的精神原乡,承载着侨胞海外奋斗的集体记忆,孕育了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文化资源。从特色建筑等物质文化资源,到侨批、传统技艺、侨乡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分支。然而,传统保护与传播模式下,侨乡文化资源面临“沉睡”风险:部分建筑因岁月侵蚀破损,口述史随老一辈侨胞离世面临失传,文化传播也受地域限制,难以触达全球数千万侨胞。当前,广东作为中国侨乡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在侨乡文化数字化建设方面立足资源禀赋与现实需求,构建了“资源整合-技术深化-人才支撑-运营保障”的系统性发展框架,既遵循文化数字化的普遍规律,又彰显侨乡地域特色,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赋能的发展格局。

夯实数字化基础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数字化的前提是实现资源的有序归集与标准化管理。“国家-省-市”三级侨乡文化数字资源库的构建,本质是通过行政层级协同,解决文化资源“分散化、碎片化”问题,实现从“资源存量”到“数据增量”的转化。

在广东实践中,江门成为市级资源整合的标杆。其核心逻辑在于以“重点文物保护”为切入点,构建“规划-建档-建模-平台”的全流程体系:首先为开平碉楼、赤坎古镇近代建筑群编制专项保护规划,明确数字化保护的核心范围;其次建立覆盖建筑结构、历史背景、侨乡故事的数字档案,实现文化信息的结构化存储;最后通过高精度建模技术完成45座核心区碉楼的数字化呈现,并搭建开平碉楼数字化展示平台。开平碉楼数字化展示平台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智慧旅游十大优质项目,不仅验证了市级资源整合的可行性,更形成了可复制的数据标准,为省级、国家级资源库的扩容提供了“最小单元”样本。

激活数字传播力

文化数字化的关键在于“技术与

文化属性的适配”,即根据物质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特征,选择能最大化呈现其核心价值的技术手段。这一理论逻辑在广东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物质文化资源,通过VR技术实现“沉浸式体验”。例如,通过数字建模还原碉楼的内部结构(如侨养生活的房间、防御设施)、外部环境(如周边的侨乡村落、农田),用户可通过“线上漫游”感受“侨胞旧居建碉楼、守护家园”的历史场景,实现从“观看文物”到“体验历史”的升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小程序与短视频实现“互动式传播”。广东的实践以江门启明里侨批馆为核心,构建“解读+传播”的技术应用体系:一方面,开发互动式侨批解读小程序,通过“原文扫描-文字翻译-历史背景弹窗-侨乡故事音频”的功能设计,让用户从“被动阅读”转向“主动探索”;另一方面,结合广东侨乡民俗(如台山飘色、新会鱼灯)开发短视频,以“短平快”的传播形态适配移动端用户习惯,通过“民俗表演+侨胞记忆”的叙事方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小众传承”走向“大众认知”。

构建人才支撑体系

文化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供给”,而“高校培养+企业培训”的产学研协同模式,是解决“文化人才不懂技术、技术人才不懂文化”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路径。这一理论在广东的实践中形成了清晰的“层级化布局”。

高校要培养“文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广州、深圳作为广东高校资源的集聚地,承担“高端人才培养”的功能。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可依托“历史学(侨乡研究方向)+计算机科学(数字建模、人工智能方向)”的学科交叉优势,开设侨乡文化数字化相关课程,培养既懂侨乡历史文化、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地方要培养“基层实操型人才”。开平、台山等侨乡核心区则侧重“基层人才培训”,其逻辑在于“本

地化人才更懂地方文化,能更好地衔接技术与本地资源”。当地企业(如文旅开发公司、数字技术企业)与科研机构(如江门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开展培训,内容聚焦“数字档案采集、简单建模工具使用、侨乡故事整理”等实操技能,例如教基层工作人员如何拍摄侨乡老建筑的细节照片、如何整理侨眷口述历史并转化为数字文本。

保障长效发展

文化数字化项目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单一的资金来源难以支撑长效运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捐赠”的多元资金模式,是平衡“公益属性”与“市场属性”的关键。这一理论在广东的运营实践中形成了可复制的样本。

江门冈冈镇的“研学+体验+消费”一体化模式,为多元运营提供了实践参考。其核心逻辑是“以文化体验带动消费,以消费反哺数字化建设”:政府主导规划侨乡研学路线,吸引学校、旅行社参与;企业投资开发研学配套服务,通过“体验收费、产品销售”获得收益;同时,政府引导设立侨乡文化保护基金,鼓励侨胞、社会机构捐赠,专项用于数字化平台的维护与更新。

在数字文创变现方面,广东的探索聚焦“侨乡IP的价值转化”。例如,开发开平碉楼主题的数字藏品、侨批元素的虚拟纪念品,用户购买数字藏品后,可获得“线上漫游碉楼的专属场景”“侨批故事的独家音频”等附加权益。这种变现方式既符合“数字经济理论”中“IP赋能”的发展趋势,又让侨乡文化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增值”,形成“数字化建设-文化传播-商业变现-再投入建设”的闭环,为侨乡文化数字化的长效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

作者简介：江传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莫海霞，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注：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SXZWT01-07)成果